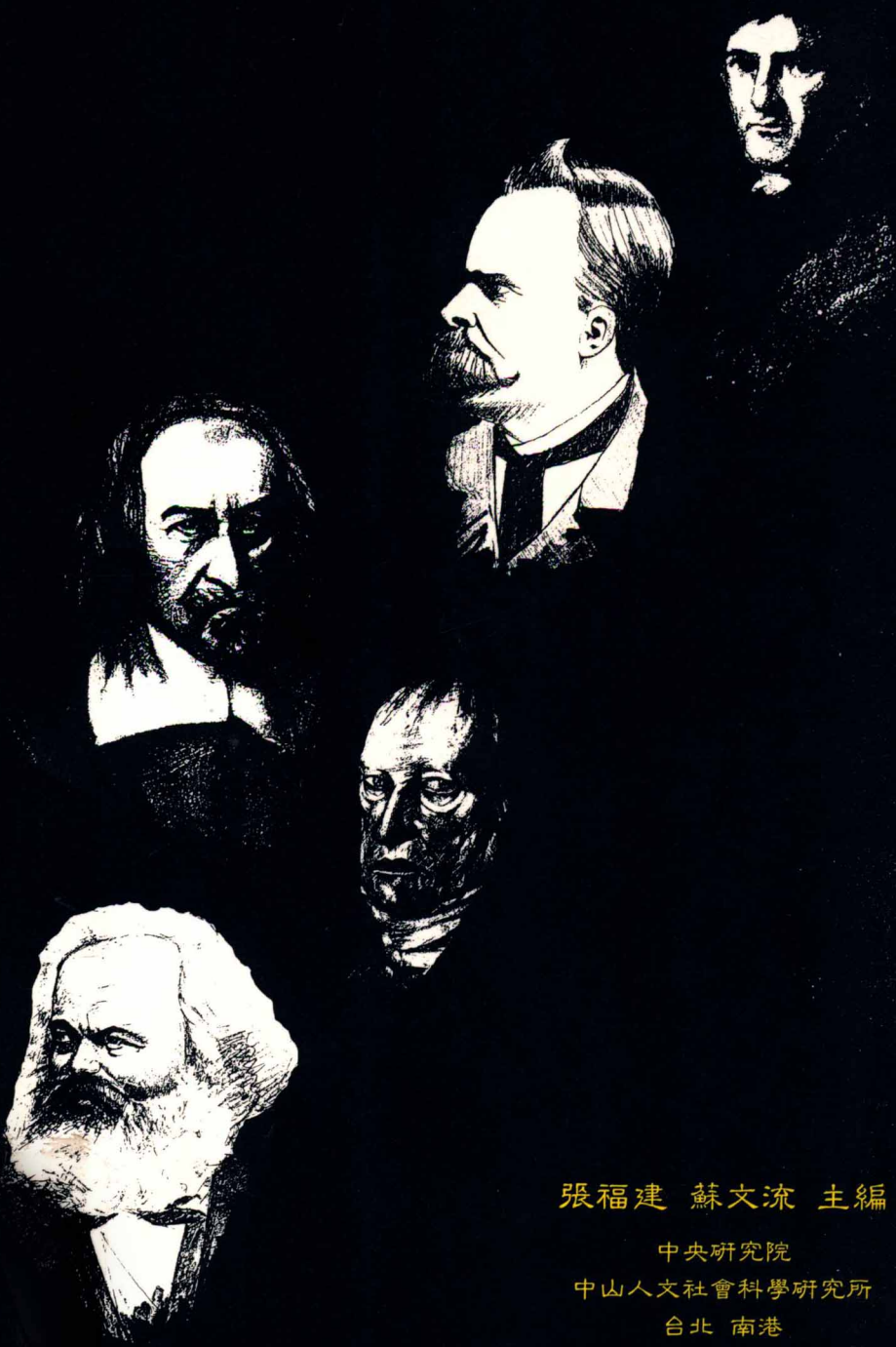


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



張福建 蘇文流 主編

中央研究院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台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5）

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

張福建 蘇文流 主編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臺北 南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張福建、蘇文流主編。
--[臺北市]：中研院社科所，民 84
面；公分。--（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5）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671-333-1（平裝）

1. 民主政治 - 論文，講詞等 2. 民主制度 -
論文，講詞等

571.607

84006160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5)

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

主 編 張福建、蘇文流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定 價 平裝 300 元
郵政劃撥 10317005 帳號 郵政劃撥手續費請向付
戶 名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電 話 (02)2789-8120
印 刷 者 國軒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中和市立德街 52 巷 11 號二樓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刷

GPN: 100840011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言

民主政治的理念淵遠流長，但視之為一個理想的政體或生活方式，則是相當晚近的發展。就其希臘字源來看，民主政治的涵義非常簡單：意謂「人民的統治」或者是「人民的權力」，也就是政治權威的最終基礎是來自人民的支持、擁護、同意、參與等；但是，這個概念所牽涉到的問題、面向、理論等卻異常的複雜；而近年來，我國正在朝往民主政治的途中邁進，對這個概念及其相關問題作一番思維，更是具有時代上的意義。因此，本所有志於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些同仁，乃擇定此一概念作為中心主題，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假本所第一會議室，舉辦「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學者專家一百多人，共濟一堂，對這一主題作深入而廣泛的探討。

研討會舉辦的日子，正值盛夏，艷陽高照，酷熱難當，但是出席參與者卻是十分的踴躍，發言盈庭；室外的高溫，與室內的氣氛，可說是相互輝映，討論之熱烈，至會議結束，未嘗稍減。會中及會後，承蒙多位同道先進或面告、或撰文，對此次研討會予以肯定與讚賞，更是對本所同仁的莫大鼓舞。本人謹代表本所，向所有冒著溽暑前來參與會議的學者專家以及他們的熱忱與勉勵，致以十二萬分的敬意和謝意。

本研討會承政治組前主任郭秋永先生的籌劃，張福建和蘇文流兩位先生的連繫與執行，所內各位研究同仁和行政同

仁的參與配合，得以順利進行。而本書能夠順利出版，更要感謝各篇論文的審查人、本所出版委員會各位委員、政治組前後助理鄧若玲、蔡靜華、游錦雲三位小姐、以及出版室林蓮治與任淑華兩位小姐等人的心力與辛勞。

本會議共邀約論文十八篇，其中二篇之作者於會議期間適留國外，不克出席，經徵作者同意，併入送審程序。本書共計收錄論文十五篇，均經作者的修改、補充與訂正，並依本所規定送審後出版。全書的編排約略分為兩部份：一為思想家研究，依其大致上的年代按序而列；另一為主題研究。研討會舉辦的該年，恰逢 Cleisthenes 奠立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基礎屆滿二千五百年，在這週年紀念中對民主政治作理論上的思考與討論，更是深具意義。本書的出版，祇是對民主政治的初步探討成果，疏陋在所難免，尚祈各方先進同道不吝賜正是幸。

彭文賢

中研院社科所所長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目 錄

蘇格拉底與民主政治.....	蘇文流	1
激進輝格與保守輝格的民主理念：潘恩與 柏克的對比.....	陳思賢	21
盧梭社會契約論的評析：一個奠基性迷思 的轉變.....	沈清松	51
理性公民共同體：黑格爾民主理念之重構.....	蕭高彥	73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主理論與實際的析評.....	洪鎌德	93
漢娜·鄂蘭論政治參與與民主.....	江宜樺	123
海耶克論現代民主政治中的自由問題.....	何信全	153
羅蒂的民主思想：輕鬆一下嘛！.....	蔣年豐	171
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民主理論及其在 公民教育上的意義.....	楊深坑	199
吳爾漢論「民主的矛盾」.....	戴 華	225
寬容的意義及其限度.....	張福建	249
民主與個人自主性.....	許國賢	277
第三世界人權觀念的探討：1986年聯合國 「發展權宣言」的初步分析.....	陳秀容	301
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與民主轉型.....	徐火炎	335
邏輯實證論與民主理論：驗證問題的探討.....	郭秋永	371

蘇格拉底與民主政治*

蘇 文 流**

壹

本文的主旨，是想探討下列的一個簡單問題：蘇格拉底對民主政治抱持著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或看法？¹究竟蘇格拉底是支持或主張民主政治，還是反對民主政治？這個問題在研究蘇格拉底思想的學者之間，一直是一個爭論性的議題：因為問題雖然簡單，但是要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似乎並不容易。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蘇格拉底本人從未明確的表示他是贊成還是反對民主政治，有關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都是隱含在他與別人的對話內容之中，我們必須從這些對話中，重新整理並且建構出我們的論題；²二是蘇格拉底在各種不同場合的對話內容中，同時存在著支持雅典民主政治以及反對民主政治的意含。由於這兩點原因，所以學者在探討這個問題時，便出現了眾多的解釋。這些解釋大致上可分為兩種互相對立的立場：一種是認為蘇格拉底是一個反對或者敵視民主政治的人；另一種則認為蘇格拉底是一個贊成或者是擁護民主政治的人。現在把這兩派不同立場學者的觀點扼要說明如下：

一、認為蘇格拉底是反對或是敵視民主政治的學者例如巴克 (Ernest Barker)、泰勒 (A. E. Taylor)、古士瑞 (W. K. C. Guthrie)、溫斯

* 本文承蒙會議評論人朱堅章教授，與會學者，以及兩位審查人惠賜寶貴的意見，作者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皮爾與斯爾瓦堡 (Alan D. Winspear & Tom Silverberg)、以及伍德與伍德 (E. M. Wood & Neal Wood) 等。巴克認為，由於蘇格拉底對知識的重視，這種「知識至上論」如果應用到政治的範疇方面，很容易就會轉變成一種「開明專制論」的主張，因此，那些擁護君主制度或專制政治的人就可以從蘇格拉底那裏得到鼓舞，而就這一層意義來說，蘇格拉底是民主政治的敵人 (Barker, 1970: 111)。而泰勒 (A. E. Taylor) 認為蘇格拉底不可能贊成民主政治，因為大多數的民眾缺乏一種有關善與惡的知識，他們甚至並不認為這種知識是在處理公共事務時的必要條件，以泰勒的觀點來看，他認為蘇格拉底對民主政治的批判，甚至超過了柏拉圖 (Taylor, 1933: 141-144)。古士瑞也同意泰勒及巴克的看法，認為對蘇格拉底來說，政治事務的管理是一種藝術，有賴於知識，而公民大會的成員以及由抽籤選出來的官吏們是不會具有這種知識的 (Guthrie, 1971: 95-96)。而溫斯皮爾與斯爾瓦堡以及伍德與伍德甚至認為蘇格拉底有意勾結他那些保守派的朋友，來從事推翻雅典的民主政治，而代之以貴族——寡頭的精英政治 (Winspear and Silverberg, 1939: 84; E. M. Wood and Neal Wood, 1978: 97)。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除了他的一個好朋友阿爾基比阿德 (Alcibiades) 曾經一度投奔斯巴達之外，他的另外兩個好友，同時也是柏拉圖的舅父，克力底阿斯 (Critias) 以及卡米達斯 (Charmides)，也都是三十寡頭中的重要成員。³

二、可是另外有一些學者卻認為蘇格拉底是贊成或者是支持民主政治的，例如古理 (Norman Gulley)、華拉斯圖斯 (Gregory Vlastos)、以及巴柏 (Karl Popper) 等。古理認為道德專家即使存在，蘇格拉底也不會贊同柏拉圖所提由國家干涉個人教育的主張 (Gulley, 1968: 176-177)。華拉斯圖斯 (簡稱華氏) 則透過對《克里圖》的闡釋 (Crito, 52b-54c)，認為蘇格拉底雖然稱讚由寡頭統治的幾個鄰國：斯巴達、克里特、底比斯以及馬加勒 (Sparta, Crete, Thebes, and Megara)，認為他們是治理良好的國家，但畢竟蘇氏最後還是選擇了雅典，因為雅典及雅典法律讓他感到滿意，而蘇氏對雅典法律的欣賞也就代表了他對

雅典民主政治的欣賞與支持，因為根據華氏的理解，選擇雅典法律就是選擇雅典的民主憲法 (Vlastos, 1983: 495-516)。

另一個認為蘇格拉底支持民主政治的學者是巴柏。在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中，他稱呼蘇格拉底為一個「好的民主人士」(a good democrat) (Popper, 1977: 128)，他認為蘇格拉底的受審與被處死的這一事件顯示出蘇格拉底是為自由而戰，而且是為自由而死 (Popper, 1977: 306, n.55)，他是一個反威權主義的人 (Popper, 1977: 129)。因此巴柏認為蘇格拉底是「一個開放社會的擁護者，是民主政治之友」(Popper, 1977: 191)，而柏拉圖後來在《理想國》中所提出來的威權政治理論，是跟蘇格拉底的理念背道而馳的，因此可以說柏拉圖是「背叛」了蘇格拉底 (Popper, 1977: 194)。

上面所提到的兩派學者所代表的兩種看法，多多少少都有他們的根據，但是任一種看法都有可能祇是道出蘇格拉底政治思想的其中一面，而不一定能夠觀照到其全面，因此，有些學者另闢蹊徑，試圖對蘇格拉底政治思想其中的一個主要部份——對民主政治的態度，提出一個比較「週延」的解釋，以便能夠「窺其全貌」，現在把這一派學者的主要觀點扼述如下：

假使我們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分從理想面與現實面兩個角度來分析的話，那麼就前者來說，蘇格拉底對於民主政治是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就後者來說，他對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下所賦予的思想及言論自由，尤其是探討道德問題的自由，是給予高度評價的，而這個跟他所重視的哲學探討作為人生的要務，以及道德知識與正當行為之間的關連性是有密切關係的，蘇格拉底讚賞並珍視雅典法律所給予個人言論及思想的自由，使得他以哲學探討作為終身的職志成為可能，即使他稱讚斯巴達等為治理良好 (well-governed) 的國家，但他寧願選擇留在雅典，因為自由討論、自由探

索是實踐人生要務的必要條件。因此，就這一現實層面來說，蘇格拉底是支持民主政治的。

持這種解釋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兩位學者，他們是克勞特 (Richard Kraut) (Kraut, 1984) 和艾文 (T. H. Irwin) (Irwin, 1986: 400-415; 1989a: 184-205)。大致上我的看法與他們的看法相似：在蘇格拉底的政治哲學之中，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是精英統治——如果道德專家存在的話，則國家的政治權力應該掌握在那些少數具有道德知識的專家手中。但是我有幾點看法與他們不同：第一、我認為按照蘇氏思想的推論，則對蘇氏而言，精英統治可能還不算是最高與最後的理想；第二、雅典民主政治與個人思想及言論自由兩者之間所存在的關係，是一種或然的關係，而非必然的關係，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及容忍似乎並不需要預設民主政治的存在，因此，在推論上，支持民主政治並不一定是支持、讚賞、珍視思想與言論自由及容忍的必然結果 (corollary)。第三、如果我在第二點的看法是對的話，那麼一個政治制度祇要能夠保障思想及言論的自由，或者對這些自由不予干涉，則這些政治制度究竟是君主制政體、貴族政體或寡頭政體，還是民主政體，對蘇氏來說，都並無差異 (indiscriminate)。換言之，即使在現實面下，蘇格拉底也並不需要獨厚於民主政治。本文大致上分兩部份，其一是探討蘇格拉底對民主政治的批評，其二是就蘇氏的政治思想而言，理想的政治與現實的政治可能是怎麼樣的狀況，提出個人一些初步的看法與分析。

貳

蘇格拉底對民主政治的批評，主要是透過對一般大眾的評價而呈現出來。蘇格拉底對於一般大眾，⁴也就是構成雅典公民主體的大多數人的評價可以說相當的低，在早期對話錄裏有幾段記載可以說明他對一般人的了解與看法：

首先，在《辯護》篇裏，馬勒達斯 (Meletus) 指控蘇氏腐化雅典的青年，在他與蘇氏的對話中，馬勒達斯認為絕大多數的雅典人都知道怎樣去教育他們的子弟，而且使他們經由教化而有所進步，唯有蘇氏使他們的子弟腐化。蘇格拉底則利用訓練馬的比喻來回答他：他說祇有懂得怎麼樣訓練馬的專家才能夠使馬獲得好處，有所進步，其他大多數對馬的訓練一無所知的人，假如也去訓練馬，其結果祇有把牠們糟蹋而已。蘇格拉底認為馬的訓練是如此，其他所有動物的訓練也是這個道理。因此，蘇格拉底在這段話裏，除了隱約的否認馬勒達斯的指控之外，也明白的表示出：一般大眾對他們子弟授與道德教育的能力是有所不足的 (*Apology*, 24c-25b)。

爲什麼他會有這種看法呢？因爲一般大眾本身的道德能力就有問題，多數人無法接受任何人對於不義、不法、和不當行爲的規勸和反對，爲正義而戰的人遲早還會喪命，所以與其擔任公職而死於非命，不如以個人的身分來從事探討與辯論。因此在同一卷中 (31c-32a)，蘇氏告訴審判團爲什麼他一直避免參與雅典的政治生活，因爲他的神示阻止他參與，幸好他沒有涉入政治活動，否則他早就沒命。然後他說：「如果有人反對你們，或者反對任何大多數人，而且阻止你們從事不義或者是不法的行爲的話，那麼你們是不會放過這個人的。」這段話所指的對象除了是當時的審判團成員之外，還包括一般的大多數公民，因爲他隨後舉出一個例子，在阿堅留賽 (Arginusae) 之役中，十位海軍指揮官因失職而導致眾多戰士溺斃，在提交公民大會的議案裏，輪值的執委會通過建議將這十位指揮官交付集體審判，集體審判是違反雅典法律的，而當時祇有蘇格拉底一個人力排眾議、堅決反對，而這還是發生在三十寡頭政權成立之前的民主政治時代裏 (*Apology*, 32b-c; Guthrie, 1971: 59-60)。上述所引蘇氏所說的一段話是相當強烈的，這表示大多數人的道德能力是有問題的。

另一方面，大多數人也並不是很有理性，常常容易流於感情用事，即使是審判團也避免不了。蘇格拉底指出，他觀察到有不少被告在出席審判團時，往往帶來他們的親戚朋友，甚至連在襁褓中的子女

也一併帶來，然後在庭上哭泣、叫冤、哀求、並且涕淚泗橫，以博取審判團最大的同情。爲了開釋，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甚至連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到了庭上，也一樣的向審判團乞求、取悅他們，以換取開釋。蘇氏認爲，審判員的義務是公正的判斷，而不是憑一己的好惡，蘇氏在庭上要做、所應做的，是告訴他們事實真相，並使他們了解蘇氏的立場與道理。可是，那些厚顏無恥的手段：飲泣、哀號、乞憐、與取悅，卻是「你們最喜歡聽的、最習慣聽的」(*Apology*, 34b-35d, 38d-e)。

在《克里圖》裏面，蘇格拉底也同樣顯示出他對一般人的道德判斷能力的質疑，甚至是否定：

當蘇格拉底與克里圖討論蘇氏應不應該逃走的問題時，克里圖所關心的眾多事情之一，就是「別人的看法會怎麼樣？」而蘇格拉底的回答是：不要在乎多數人的意見，而應該在乎少數最好的人，最值得我們考慮的人的意見，也就是少數對這個問題有透徹了解的智慧者、專家的意見。因爲多數人既不能爲最大之善，也不能爲最大之惡，而且也無法使人變得有智慧或愚蠢，他們祇是任意而爲(*Crito*, 44c-d)。因此，我們應該讓理性決定一切，經過反省後決定什麼是最好的行爲；同時，做人做事要有原則，即使監禁、沒收財產，甚至處死，也不能嚇倒我們，而使得我們的思想混亂。有關這件事——逃走或不逃走，服從或不服從，有些人的意見應該考慮，而另一些人的意見則應予忽視。如果我們繼續追問：應該考慮什麼樣的意見呢？蘇氏指出，我們應該考慮好的意見，而智慧的意見就是好的意見。換言之，我們應該考慮並且聽從了解這個問題的本質，並且能夠掌握其知識的專家的意見，如果我們不聽專家的意見而祇考慮一般大多數人的看法，就會帶來惡果，例如有關身體的健康、強壯方面的事情，就應該聽從少數專家——醫生的意見，而不是外行——多數人的意見，否則如果接受錯誤的建議，身體便會受到傷害。同樣的，有關道德行爲方面的問題：義與不義、好與壞、對與錯等的問題，當然也是應該聽從這方

面專家的意見，而不應該屈從於多數人，雖然多數人有權力可以把我們置諸死地，但這卻是不相干的兩回事 (46b-48b)。

在同卷中，當蘇氏逐漸建構他的正義原則之後，便敦促克里圖仔細的考慮這些原則，是否接受，因為蘇氏知道「向來」就很少人會願意接受這些正義原則的，而接受這些原則的人與不接受的人兩者之間是無法討論問題的，因為彼此缺乏前題與論證的共同基礎。⁵在這裏蘇格拉底強調向來就很少人會願意接受他的正義原則：現在如此，以後也是如此——這是一個經常性及一般性的現象，大多數人寧願接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害報害、以惡報惡、以不義還不義的原則。因而就很容易做出不義的行為出來。

這種對多數人在道德觀念的傾向，在道德能力方面的了解，固然是蘇格拉底透過日常生活中與別人交往、討論的經驗而來，但是基本上卻是源自他對知識的重視：道德德行、教育、訓練、公共事務等若沒有對相關知識的掌握，其結果祇會帶來傷害與不幸。常識、理所當然的觀念，傳統的想法、公共意見，是大多數人日常行為以及做決定的根據，但卻是不可靠的根據，因為內中不乏假的及矛盾的觀念，依賴這些錯誤及矛盾觀念所作的行為，其結果可想而知。因此，一個好的決定不是來自投票，不是來自多數的意見，多數並不就代表正確。在《拉喀斯》(*Laches*)裏有關軍事訓練的決定就是一個例子：賴斯馬卡斯 (*Lysimachus*) 就有關他兒子是否應該接受盔甲武裝戰鬥訓練一事，徵詢兩位名將的意見，其中一位將領尼基阿斯 (*Nicias*) 表示贊成，另一位將領拉喀斯卻反對，於是賴斯馬卡斯便要求蘇格拉底表示意見，究竟他支持那一邊的看法，賴氏將根據多數人的意見作決定。而這種方法卻受到蘇格拉底的反對：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徵求受過良好訓練、技術嫺熟的軍事專家的意見，而不應該訴諸於表決。假設蘇氏、賴氏、拉氏、及尼氏四人的主張相同，卻與軍事專家意見相反，那麼就這一問題上，軍事專家的一票足可否決他們的四票，四票所代表意見的價值比不上一票所代表意見的價值，因為「要作一個好的決定時，所根據的不是多數，而是知識。」(*Laches*, 184c-e) 同樣的，在

探討及辯論問題時，也是秉持這種精神，蘇格拉底寧願與個別的人作一對一的辯論與對話，而不願意與一群人討論，因為一方面辯不清楚，而且另一方面，訴諸一群人的意見，來決定辯論內容的孰是孰非，這是毫無價值，也是毫無意義的 (*Gorgias*, 474a-b)。

然則蘇格拉底這種反對以量取勝，輕視大多數人的知識與道德能力的態度，是否一如古士瑞以及伍德與伍德所說的 (*Guthrie*, 1971: 90; *Wood and Wood*, 1978: 101)，其對象祇限於一般勞動大眾以及販夫走卒 (*banausoi*) 呢？畢竟勞動大眾比起富裕的人來，更缺少閒暇的時間來從事知識的追求與道德的探討；同時，蘇格拉底也批評雅典爲了幫助窮人以便他們能夠參與政治活動的補貼制度。⁶抽籤制與補貼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徵，而後者與前者相比，意義更爲重大，藉著這個措施，多少可以彌補窮人因參與政治活動而損失的工作報酬，因而在實質上，擴大了公民參與政治的範圍與基礎。因此，攻擊補貼制就是攻擊雅典民主政治，就是歧視一般勞動大眾，是企圖要把他們排除在政治參與的活動之外，所以蘇格拉底是一個輕視勞動大眾，反對民主政治、支持寡頭統治的人。⁷

但是我認爲這種看法並不完全正確，或者是並不如此簡單。蘇格拉底輕視大眾，但並不必然輕視勞動大眾，如果我們認爲他對勞動大眾有所偏見的話，那是一種巧合：窮人恰巧是佔多數的人，或多數人恰好都是窮人。雖然每日圍繞在旁聆聽蘇氏與別人對話的大多是富人 (*Apology*, 23c)，但是他願意與任何人對話，探討道德與知識的問題，不論對方是老還是少、是窮人還是富人 (33a-b)，也不論對方的身份或從事的職業：詩人、戲劇家、從政人士、工匠等 (22a-d)，他的目標是希望雅典裏每一個人都檢討自己的生命 (29d-30b, 30e-31a)，因爲不經檢討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38a)，而他嚐試要說服每一個人重視其靈魂與美德勝於重視實際利益 (36c)。另一方面，批評補貼制固然是在批評民主政治，因爲這是使窮人能夠參與政治活動的重要措施。但是我認爲他對補貼制的批評，主要的重點不在針對窮人參政，而是在於其他方面，第一、他認爲補貼制帶來了不好的影響，使得雅典人變得懶

散、懦弱、好辯，而且貪得無厭 (*Gorgias*, 515e)；第二、擴大參與政治者的人數及範圍並不見得就能提昇政治生活及政治決策的品質，多數人所做的決定不一定就是好的決定，甚至相反，因為大多數人在道德上都有其缺陷：(1) 他們所秉持的道德觀念大多是誤謬的，(2) 他們常常做出不道德的行為或事情出來，因此他們也無法對其子弟給予適當的道德教育。

為什麼大多數人會有這種缺陷呢？因為 (一) 他們強不知以為知，但卻經不起蘇格拉底的檢驗，(二) 他們無法接受蘇氏的道德原則，祇會固守傳統觀念 (*Crito*, 49c-d)，(三) 缺乏道德知識。而這些人卻是經由投票或抽籤而出任政治職位，掌握政治權力，做出國家決策的人。既然多數人在道德與知識上有這些缺陷，則由多數人所組成的政府，所制訂的決策自然也有問題。所以蘇格拉底輕視、反對以量取勝、以量代質作為政治事務管理的標準，特別是以多數決定作為衡量知識，尤其是道德知識真實性的標準。政治事務，是人類各種事務的一環，所需要的是專業知識，尤其是領導人們過一種幸福生活的知識，純粹以人數的多寡來作標準，可以說是荒謬的。就這一點來看，蘇格拉底對雅典民主政治確實是抱著一種批判的態度的。

參

在蘇格拉底心目中，既然民主政治有那麼多的缺失，那麼究竟什麼樣的制度應該替代它呢？什麼樣的統治方式才是理想的統治方式呢？從他對民主政治的批評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多數人的道德能力不夠，常做出不道德的行為，例如不法與不義、同時道德知識欠缺或錯誤。這是大多數人的通病，也許極少數人能夠避免這些缺憾，如果我們能夠發現這些極少數人，並且能夠確定這些人異於一般大眾——他們能免於大眾所犯的道德錯誤與缺陷的話，那麼祇有這些極少數的人才資格、才應該統治。因為既然百工各有其專長，而在日常生

活中我們都是根據需要而去尋找相關的專家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爲什麼獨獨在更重要的政治事務處理上，卻是不分其專長、不論懂與不懂而人人都得參與呢？所以蘇格拉底就批評這種現象，他說：

當我們在公民大會集會的時候，國家若需要進行某項建築工程的話，我們就會請來建築師，就有關結構方面的建議請教他們；如果是要造船，我們就會諮詢船舶設計師，其他的事情也是這樣，祇要大會認為某種技能是能學能教的（我們都會延請相關的專家來處理）。如果任何人想就任何（工程計劃）事項發表建議，而大會又不認為他是這方面的專家的話，那麼不管他是多麼的英俊、多麼富有，或者出身多麼高貴，都不會有什麼差別，人們會用輕蔑的語調大叫，要他下來，直到他停止發言並被噓叫下來為止。不然的話，主持會議的官員就會命令會場警衛把他拖出去。當他們認為所面臨的問題是涉及專門技術事項的話，大會就是用上述的態度來處理的。可是當大會討論到有關國家的管理問題時，那麼不管是誰，人人都會站起來發言，提出各種建議——建築工、鐵匠、鞋匠、商人、船東、窮人、富人、出身高貴的或出身低微的，但情形卻與前面所舉的例子不同，沒有人會出來阻止他們發言。雖然這些人沒有（治理國家的）專門技術，也說不出誰是他們的教師，可是他們卻試圖提出建議。其中的原因一定是他們不認為這種事情是可以教得來的（Protagoras, 319b-d）。

蘇氏所感到不解的是，大家都知道並且同意建築、造船等工程應該邀請有關的專家來處理，也就是具有相關資格的人來處理，何以惟獨在面對有關統治國家這種更重要的事情上，卻人人都得參與，而不須考慮到專家及相關資格的問題，在蘇氏看來，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而且多數人在道德上的瑕疵，已如前面所述，因此，在有關管理

眾人之事，有關統治國家的大事方面，更應該尋找這方面的專家，更應該強調相關的資格。

所以，當我們提出下列的一個問題——「誰來統治？」或「誰應該統治國家？」蘇格拉底會提出他的「專家政治」的主張：少數的道德專家應該掌握政治權力，統治國家，因為他們具備所需的道德知識，可以把國家管理得好。蘇氏這種「專家政治」主張的背後，是一套極端複雜的思想體系，在本文中無法詳細處理，祇能就其有關的論點扼要簡述如下：

所謂道德專家是指能夠掌握道德知識，也就是能夠回答“*What is X?*”的「蘇格拉底定義」問題(例如：「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正義？」等)，並且能夠為其解答提出有力的辯護。同時，所謂專家是指「能夠(對有關事物)提供權威性的指引，並且有一套理性的論證來支持他的指導。」⁸因此，道德專家是達到道德發展的最高境界的人，也就是能夠掌握有關各種美德的定義的人。如果我們能找尋到這些人，則國家的權力應該掌握在這些道德專家當中，因為如此，才能夠使我們在面臨重大且困難的實際問題時，提供一個有效的行為標準，在制訂國家政策時，才有正確的道德知識作為指導規範，同時也能夠促進及提昇人民的道德發展，道德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成為一個有美德的人，而美德就是最高的價值(*Euthydemus*, 281d-e, *Protagoras*, 361b)。就個人來說，照顧好自己的靈魂是最重要的，而美德就是靈魂的最佳狀態；幸福是一種最高的最後的人生目標，而美德是構成幸福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任何美德都是可羨的、好的以及有利的。就國家方面來說，一個好的統治者其施政的最高目標是使公民獲益——成為有美德的人，也就是使被治者的靈魂得到幸福(*Gorgias*, 463d-465e, 503d-504e; *Republic*, 341c-342e, 345d-347d)。⁹國家正確的角色是促進公民的美德與智慧，不是財富或自由等，這些事物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祇有美德與智慧才是惟一的目標與價值(*Euthydemus*, 292b-c)。歸納言之，對於人、統治者及國家角色的評判標準就是是否具有或促進公民的美德(*Gorgias*, 515b-517c; *Republic*, 345e-347a)。也因此